

韩国哲学史

(上)

韩国哲学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韩国哲学史

(上 卷)

韩国哲学会编

白 锐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字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历任编辑委员

(按韩国语字母顺序)

第13任 金泰吉会长任期(1974年5月—1977年6月)

发起委员: 金泰吉, 李奎浩, 李乙浩, 千玉焕, 李楠永
评议员: 金泰吉, 金忠烈, 金炯孝, 朴钟鸿, 苏光熙,
李楠永, 李相殷
实务委员: 金忠烈, 金炯孝, 苏光熙, 李楠永
编辑委员: 高亨坤, 金忠烈, 金泰吉, 朴钟鸿, 柳承国,
李奎浩, 李楠永, 李相殷, 李乙浩

第14任 李奎浩会长任期(1977年6月—1979年6月)

编辑委员长: 李奎浩
常任编辑委员: 李楠永, 徐用和
编辑委员: 高亨坤, 金泰吉, 裴宗镐, 苏光熙, 申一澈,
刘明鍾, 柳承国, 尹丝淳, 李乙浩
责任编委: 金淙镐, 金忠烈, 韩端锡, 姜声渭, 金丽寿,
金炯孝, 孙凤镐, 李英浩

第15任 李钟厚会长任期(1979年6月—1981年6月)

常任编委: 琴章泰, 徐用和, 李楠永
编辑委员: 高亨坤, 金泰吉, 金炯孝, 裴宗镐, 申一澈,
刘明钟, 尹丝淳, 李乙浩
责任编委: 李钟厚, 姜声渭, 金三龙, 车仁锡, 朴东焕,
苏兴烈, 李明贤, 李英浩, 秦教勋

第16任 尹明老会长任期（1981年6月—1983年6月）

编辑委员长：李楠永

常任编委：琴章泰，徐用和

编辑委员：高亨坤，金泰吉，金炯孝，裴宗镐，申一澈，
刘明钟，尹丝淳，李乙浩。

责任编委：尹明老，姜声渭，金炳宇，朴东焕，朴琮炫，
苏兴烈，孙凤镐，李明贤

第17任 申一澈会长任期（1983年6月—1985年6月）

编辑委员长：李楠永

常任编委：琴章泰，徐用和

编辑委员：高亨坤，金泰吉，金炯孝，裴宗镐，刘明钟，
李乙浩

责任编委：申一澈，苏兴烈，柳俊秀，赵熙荣，朴焕植，
尹丝淳，李初植，崔道熙

第18任 韩荃淑会长任期（1985年6月—1987年6月）

编辑委员长：李楠永

常任编委：琴章泰，徐用和

编辑委员：高亨坤，金泰吉，金炯孝，裴宗镐，申一澈，
刘明钟，尹丝淳，李乙浩

责任编委：韩荃淑，金熔贞，柳炳德，河永晰，金荣振，
李三悦，李汉龟，秦教勋

执 笔 者

- | | | |
|------|---------------------|-----|
| 第一篇 | 古代神话表现的韩国人的
哲学思维 | 金炯孝 |
| 第二篇 | 三国时代的哲学思想 | 李乙浩 |
| 第三篇 | 统一新罗时代的风流思想 | 柳炳德 |
| 第四篇 | 统一新罗时代的佛教思想 | 李其永 |
| 第五篇 | 统一新罗时代的道家思想 | 车柱环 |
| 第六篇 | 统一新罗时代的儒教思想 | 李楠永 |
| 第七篇 | 高丽时代的佛教思想 | 蔡洙翰 |
| 第八篇 | 高丽的风水图讖思想 | 裴宗镐 |
| 第九篇 | 高丽前期的儒学思想 | 裴宗镐 |
| 第十篇 | 高丽后期性理学的引进和
吸收 | 尹丝淳 |
| 第十一篇 | 朝鲜初期性理学的开展 | 尹丝淳 |
| 第十二篇 | 朝鲜中期的性理学说 (1) | |
| 第一章 | 徐敬德的哲学思想 | 李楠永 |
| 第二章 | 李彦迪的哲学思想 | 柳正东 |
| 第三章 | 李滉的哲学思想 | 柳正东 |
| 第四章 | 李珥的哲学思想 | 裴宗镐 |
| 第十三篇 | 朝鲜中期的性理学说 (2) | 金吉焕 |
| 第十四篇 | 朝鲜前期的佛教哲学思想 | 徐景洙 |
| 第十五篇 | 朝鲜朝道家哲学思想 | 宋恒龙 |
| 第十六篇 | 朝鲜朝的阳明学及其发展 | 刘明钟 |
| 第十七篇 | 朝鲜朝后期的实学思想 (第一——五章) | 琴章泰 |

第六章	李济马的四象哲学	李乙浩
第十八篇	朝鲜朝后期的佛教哲学思想	徐景洙
第十九篇	近代哲学思想的抬头	崔东熙
第二十篇	韩末及日帝占领时的民族思想	柳炳德
第二十一篇	民族抵抗时代的哲学思想	
第一章	朴殷植的哲学思想	慎镛厦
第二章	申采浩的民族主义思想	申一澈
第二十二篇	西洋哲学的传入和发展（第一——二章）	
		秦教勋
第三章	三·一独立运动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思想	
		申一澈

前 言

本学会将《韩国哲学史》的刊行作为学会的工作计划，是始于第13届金泰吉会长时，即1974年的夏季。在该年7月5日，为此工作而特别成立了评议委员会（7人），会上正式将这一刊行工作确定为学会的工作。为此，会长们出面广泛谋求财政上的资助。另一方面，由4人组成的实务委员着手制订编写《韩国哲学史》的具体计划。1975年5月，文教部和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决定提供预先申请的研究补助费和出版补助费，于是，使得这一工作步入正轨。该年5月15日，正式召开了为期9天的韩国哲学史编辑委员会会议。

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为了更加完善地著述《韩国哲学史》，尽管在此期间尚有许多其它研究工作要做，但仍应投入力量研究其中的薄弱环节，先行做好基础的研究工作，并决定先刊行《韩国哲学研究》上、下卷，而后再刊行《韩国哲学史》上、下卷共四卷。

这一刊行工作得到六堂崔南善先生创立的历史悠久的东明社当时社长崔汉雄先生的深刻理解，于是，在1975年12月正式签约；本来计划在东明社创立70周年的1977年，以一帙四卷同时出版，但是，后于该年4月首先刊行了《韩国哲学研究》上卷，下卷由于分量过重，分为中、下两卷，于1978年9月刊行。

此书的上卷出版后，即以此为基础，在下一届李奎浩会长主持下，于1977年6月20日，为刊行《韩国哲学史》上卷，编辑委员会完成了目录选定和执笔者的选入工作，并于1977年7月30日召集了执笔者会议，从此正式进入哲学史的编写阶段。大约

一年后，又先后出刊了《韩国哲学研究》中、下卷，1978年7月15日，编辑委员会对《韩国哲学史》中、下卷作了目录选定、执笔者选入的工作，并于8月11日召开了执笔者、编辑委员联合会议，又正式进入了编写中、下卷的阶段。

但是，《韩国哲学史》的编写工作与原来编写《韩国哲学研究》时相比，确实感到迟迟难进。从最初计划时算起，经过13年后的今天，才刊出《韩国哲学史》上、中、下卷。这一期间，学会换了6届会长，为了出版《韩国哲学研究》三卷书，整个5年期间先后动员了48位学者参加（各个主题论文按二位学者参加评论计算），而为编写《韩国哲学史》，就延续了10年时间，动员了19位学者参加，这也是最后计算的，因为这里还有其它各种情况，例如，开始虽接受了任务，尔后并未能参加撰述工作，或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来已执笔的原稿未能选用，不得不用其它专家来代替等等。

编写时间漫长，自应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但实际仍感到有不少未恰之处。当然，作为学会来说，应该说是最大限度集中了哲学界的代表，请大家尽力编好这部作品。现在，著作既已刊行，敬请各位识者多加指正。而作为学会希望能够寻求在这块土地上第一次编出《韩国哲学史》的意义。它不是为作品的完成而感到自负，而它内含的意义是为今后研究韩国哲学奠定了基础。

所谓韩国哲学史，是指在韩国土地上韩国人昔日开始形成的哲学研究及其产生的历史。该哲学史与其说是由这块土地创造的某种固有思想与各该时期外来思想相接相琢而成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汇集东西洋的各种思想，不断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倾向更为牢固发展的历史。5千年的漫长岁月，出现了儒教、佛教、道教等各种不同的思想，我们为写这一历史，虽委托各该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参加执笔工作，但仍难以避免由于共同执笔而必然会带来的一些不足。关于各种土俗思想和宗教思想中，究竟哪些是哲学思想的根本概念问题，我们且置勿论，就是我们执笔者全体

亦难做到以一种统一的方法论去进行共同研究，进而对各种思想和各个时期的历史的联结也几乎难以考虑周到。因此，这一部《韩国哲学史》同为编写作准备的《韩国哲学研究》类似，免不了给人还未脱离一种论文集领域的感觉。尤其是这部《韩国哲学史》，现代部分决定写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15日止，因此，从年代上继续补写完毕，是绝对需要的。

原来，历史经常是需要重新写或改写的。尤其是我们，非常希望对近来外来思想不停留在训诂和解释上，而应创出自身的哲学。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思想尽快地去整理。这部《韩国哲学史》只不过是适应这种要求而进行的准备。

我们认为尚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但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解和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帮助，也是难以完成的。对此，谨向文教部、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产学财团及峨山财团给予财政上的支援，表示深切感谢，同时，对东明社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完刊亦表谢忱。

还要借此机会，谨向金泰吉、李奎浩、李钟厚、尹明老、申一澈历代会长和最初策划时的发起委员、评议员、实务委员以及历任编辑委员表示感谢。只有最初担任评议员或编辑委员并对工作给予积极支持的朴钟鸿、李相殷两位先生和最初担任发起委员并积极活动的千玉焕先生以及负责执笔朝鲜朝性理学部分和佛教哲学思想的柳正东、徐景洙两位先生，没有最后看到这部书的出版而辞世。我们谨将《韩国哲学史》一书敬呈他们的灵前。

最后要特别提出，李楠永先生从开始到结束，对这一耗时长久的工作，均给予热心帮助，为使工作圆满结束而尽心尽力，对此，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同时，亦要向在李先生渡美期间，负责干事工作的徐用和先生表示感谢。

韩国哲学会会长

韩荃淑

1987年3月

目 录

上 卷

第一篇 古代神话表现的 韩国人的哲学思维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1)
一、哲学思维的起点.....	(1)
二、神话思维的重要性.....	(3)
第二章 韩国精神的原型	(9)
一、tu rae 和风流道.....	(9)
二、“sin ba ram”和“meos”的感情范畴.....	(12)
三、神秘的精神和光彩.....	(16)
第三章 关于韩国精神原型的评价	(21)
一、神话出现的理想型.....	(21)
二、关于原型思维的肯定评价.....	(23)
三、关于原型思维的否定评价.....	(35)
第四章 三国时代神话的集团无意识	(39)
一、方圆的调和与神话的解释.....	(39)
二、新罗精神的光明与阴暗.....	(45)
三、高句丽精神的光明与阴暗.....	(49)

第二篇 三国时代的哲学思想

第一章 三国时代哲学思想的背景	(54)
一、建国传说的吟味	(54)
二、古代国家的成立	(62)
三、外来文化的接纳	(72)
第二章 三国时代哲学思想的构成	(78)
第三章 儒教思想的开展	(86)
一、先秦儒以前的人本思想	(90)
二、先秦儒的伦理思想	(96)
三、汉唐儒的影响	(98)
第四章 道教思想的开展	(101)
一、高句丽的道教	(101)
二、百济的道教	(105)
三、新罗的道教	(107)
第五章 佛教思想的开展	(111)
一、高句丽佛教的特殊性	(113)
二、百济佛教的内容	(116)
三、新罗佛教的兴隆	(119)
第六章 三国哲学思想的本质	(123)

第三篇 统一新罗时代的风流思想

第一章 风流道的源流	(132)
一、韩国原始信仰中的风流	(132)
二、风流的神观	(135)
第二章 作为花郎的理念的风流道	(139)
一、花郎道的政治性质	(139)

二、花郎道和佛教·····	(143)
三、花郎道的风流性·····	(147)
第三章 花郎道的风流思想·····	(153)
一、三教包含的超越性·····	(153)
二、接化群生的生成·····	(155)

第四篇 统一新罗时代的佛教思想

第一章 三国统一的哲学背景·····	(159)
一、初期由高僧奠定的思想基础·····	(159)
二、花郎道·····	(172)
第二章 元晓的哲学·····	(194)
一、元晓哲学的典据及其特色·····	(194)
二、元晓的著述内含的思想·····	(219)

第五篇 统一新罗时代的道家思想

第一章 新罗社会和道家哲学·····	(253)
一、新罗前期道家的性质·····	(253)
二、通过与大陆的接触，接纳道家哲学·····	(254)
三、新罗知识层中的道家教育·····	(257)
第二章 新罗人的道家风趣·····	(259)
一、《道德经》的正式传入·····	(259)
二、新罗知识分子诗文中表现的道家风趣·····	(261)
三、自宽自乐的生活意识·····	(263)
第三章 新罗的仙风·····	(265)
一、新罗人的神仙观·····	(265)
二、仙风与花郎道·····	(267)
三、音乐的神秘和仙道的奥妙·····	(268)

第四章 新罗人的道教思想 ·····	(272)
一、道教方术及其思想背景·····	(272)
二、科仪的道教和留唐学人·····	(274)
三、新罗知识阶层的丹学·····	(276)

第六篇 统一新罗时代的儒教思想

第一章 为统一进行的制度整备和儒教思想的基础形成 ·····	(279)
一、德治政治理念的树立·····	(279)
二、按照春秋史观建立的历史意识·····	(282)
三、花郎制度的创设和其理念的实践·····	(283)
四、由忠孝发展起来的护国献身精神·····	(286)
第二章 统一以后的儒教教育和儒学者 ·····	(290)
一、儒教的生活化和政治上的活用·····	(290)
二、教育机关的制度设置·····	(292)
三、代表的学者·····	(294)

第七篇 高丽时代的佛教思想

第一章 高丽佛教的若干性质 ·····	(302)
一、太祖信佛的态度·····	(302)
二、高丽佛教的两重性质·····	(304)
三、高丽佛教的护国性质·····	(305)
四、高丽佛教重视现实的性质·····	(306)
五、诸经的会通理解倾向和混合宗教的性质·····	(307)
第二章 高丽佛教哲学的展开 ·····	(309)
一、第1期：中央集权的王权确立期·····	(309)

二、第 2 期：国家全盛期·····	(369)
三、第 3 期：国家内部相克期·····	(387)
四、第 4 期：蒙寇，国家变态衰退期·····	(419)
第三章 高丽佛教的返照、吟味·····	(430)
执笔者介绍·····	(432)

第一篇 古代神话表现的 韩国人的哲学思维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一、哲学思维的起点

正像一切生命自土地上诞生，而后又回到大地一样，使哲学的生命萌发，最终又将它收敛回去的根源地，仿佛存在于哲学世界中。“我是谁”这一提问，从根源上来看，它孕育着哲学的思维，而所有的哲学理论最终又像回到这一提问之中。

今天的现代文明，不论在东西方，好像均由外部形式对“我”作出规定的。我，反而看作受动的、被规定似的。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是根据居民登记证上的一系列番号和我的职业、学历及技能有无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评价的。其所有的规定是否就回答了关于我的真正的自我的问题呢？对此，我们难以采取肯定的态度。那么，我，究竟是谁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在那一段时间，假定我对我每天的人生，热心而忠实地用日记逐日记录下来。我的一大捆日记积累颇多，但那捆日记被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当作引火物烧掉，在一种情况下，我能说我的存在付之一炬吗？当然，我的一捆日记，从根本意义上来看，与过去的居民登记证一连番号相比，算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从内部可以得到某种相应的回答。然而，不能认为我的存在即已全部还原到这捆日记之中。那么，我的存在，

是否又由我所具有的知识程度来规定的呢？所谓知识，在哲学上又具何种意义？对这一点，法国吉恩·保罗·萨特说得极为清楚。按照萨特的意见，知识，与其说是“我所认为的”，还不如说是“以它作为手段，我所认为的”。所以，尽管知识不是我人生的奢侈品和装饰品，但在我所认为的那些方面，无疑它是占有内部不可缺少的思考阶段和手段。所以知识可以作为提高回答“我是谁？”的手段，然而，知识毕竟还不是回答该提问的。

“我是谁？”面临这一提问，我们似可回答为“我是我的一生”。但对这样的回答，听起来也还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为某种价值的宣扬和对其支撑，常常能有连我的一生一并抛弃或献出的情况存在。所以，我，是存在于我的人生以上的。这样，“我是谁？”的疑问，仍不能从迷宫中解开。

如果说，直到现在以任何努力仍找不到关于“我是谁？”的完整的回答，那么，我们即可认为该项提问乃是具有自然产生的一种自然性质，但对这一回答的正确性，还是会持怀疑态度的。例如，“我是谁”这一类提问，是否能将它同“那是什么？”一类的提问形式等同看待呢？对此，我们也是产生怀疑的。如果问“那是什么？”的时候，只要是对“那”具有知识的人，不论是谁，均可说出“那是桌子”，“那是百合花”。但是，“我是谁？”的提问，就不像“那是什么？”的提问形式，可以正确地记录下来。为什么？“那是什么？”的提问形式具有的论理的正确性，在适用于下面情况时，则变为可能。

①主客分离的论理结构，作为先决条件适合于对提问的解答与判断。

②对提问的答案，不论何时何地，必须具有能对别人传达的性质。

③该种提问和对它的解答，不是从内部与我的人生最重要部分相结合，而是作为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的人生重要部分发生联系。